

论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职业性、多样性和民营性特征

——我国发展大众高等教育若干思考

● 谢作栩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二战后, 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转变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笔者分析了世界大众化高等教育以职业性为发展方向, 以多样性的高等教育体制为保障和走民营化发展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 并就我国发展大众高等教育, 提出了加强高校与社会行业的多层面合作、加强各类型高等教育的沟通与衔接和鼓励社会力量办高等教育等观点。

关键词: 大众化高等教育; 职业性; 多样性; 民营性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On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being vocational, diversified and civil-administrated

——A reflection on development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XIE Zuoxu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presented a tendency of turning from developing top higher education to developing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ld popular high education: being vocational as its developing target, diversified as its educational system and civil-administrated as its developing measure. The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 on how universities should cooperate with all ranks of professions in society, how to enforce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kind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ow to encourage society to support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diversified, civil-administrated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掀起, 各国日益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并把高等教育看作每个人都可享有的权利。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 使高等教育步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1950年, 全世界大学生数为 649 万, 1996 年上升至 8 426 万, 扩大了 13 倍。高等教育学生人数占适龄青年人口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 呈现出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转变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Mar-

tin Trow)曾以高等教育的学生容量占大学适龄人口的比例, 即毛入学率(Gross Enrolment Ratios)为标志, 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 精英教育阶段, 即高校仅能够容纳 15% 以内的适龄青年; 第二, 大众教育阶段, 即高校容量达到适龄人数的 15% 到 50%; 第三, 普及教育阶段, 即高校容量达到适龄人数 50% 以上。当今高等教育学术界将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和普及阶段转化的进程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massification)。本文是借用这一概念来考察大众化高等

收稿日期 2000-05-10

作者简介: 谢作栩,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育的特征。] 据统计, 1996年, 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16.7%, 跨入了大众高等教育的门槛。其中, 发达区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 50.5%, 迈进了普及高等教育阶段。^[1] 世界高等教育在量的增长过程中, 也引发了高等教育观念、目标、学校类型、学术标准等多方面质的变化。在战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中, 我国政府曾于 1958 年提出“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2] 的奋斗目标, 但因操之过急, 造成了高等教育的大起大落。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尚为 11% 左右, 正处于从精英教育阶段迈向大众教育阶段的进程中。[此数据是笔者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纪宝成司长在《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光明日报》1999.1.16) 一文中所提出的新的统计口径加以计算的, 即“在校生人数=研究生数+普通高校学生数+成人高校学生数+自学考试毕业生数×5”, “毛入学率=在校生数÷(18~22)岁年龄组人口数×100%”] 1999年1月,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 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 入学率接近 15%”^[3] 的奋斗目标, 再度吹响了向大众高等教育进军的号角。然而, 该如何推动这一进程, 使我国高等教育得以健康发展呢? 本文试图从分析大众高等教育的职业性、多样性和民营性三大特征入手, 并立足于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今后我国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略陈管见。

一、职业性: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高等教育在向大众化和普及化迈进的历程中, 逐步摒弃了只为少数英才提供文科性质的非职业性教育的传统观念, 树立了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观念。现代社会的就业领域和就业方式的快速变化, 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与生产部门的密切联系, 强化了高等学校的职业教育职能。

二战以来,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高等职业教育职能。例如, 美国于 1963 年通过了《职业教育法案》, 1968 年和 1972 年又通过了职业教育法修正案, 增加了对职业教育的拨款, 使以职业教育为主的两年制学院和两年

以内的各种高等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学生数从 1960 年的 45 万上升至 1995 年的 623 万, 扩大了 13.8 倍, 而同期的四年制学院学生仅增长了 3.2 倍。^[4] 又如, 德国为了加强职业教育, 还专门建立了职教理论与基本技能训练的“双元制”制度, 以培训职业教育教师。在瑞典, 为了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市场的结合, 各高校还设立了“继续教育课程”和“独立课程”, 为在职人员提供学制为 1~1.5 年的短期职业技术学习计划。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也日益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例如, 泰国政府在 60 年代初期从工业化发展的总体出发, 制定了新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明确指出: 高等教育要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 着力培养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 以奠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智力及技术基础。其具体措施是, 一方面广办短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另一方面在大学中开设职业技术教育专科和课程。80 年代, 泰国的第五、第六两个“教育五年计划”进一步强调高等院校应以经济和社会需求为依据, 把医学、农业和工程等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到 90 年代中期, 泰国三百多所高校中, 有 28 所大学加强了工科教育, 其余均系以职业教育为主的 2~3 年制的高职高专学校。^[5] 马来西亚政府在 90 年代也加强了高等教育职业化的改革计划, 增设了 7 所工艺学院。另外, 拉美国家在 1979 年举行的墨西哥拉美国国家教育部长会议上, 明确提出了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世界密切联系的指导方针。非洲大学现在也增加了社会服务工作、新闻学、计算机、农业工程食品科学与技术等职业性学科专业。

观之, 不论是处于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阶段的发达国家, 或是正向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迈进的发展中国家, 均将面向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类职业人才作为其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 各国政府都在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强化高等教育的职业性办学方向。具体说, 一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二是专门设立面向社会各行的职业性高等院校; 三是综合性大学加大工科专业的学生比例。

从整个高等教育的职能系统来说, 第一, 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职能将大众型和普及型的高等教

育机构引向社会各行各业,同时也促进传统的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社会适应性。第二,它的社区服务职能,即来者不拒的招生政策既为大众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方便,又可起到缓冲和化解社会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冲击的作用,保护了高一层次的研究型大学的教学职能与科研职能的发挥。因此,高等教育的职业性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高等教育的职能系统。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趋势与其职业性发展方向的关系来说,二者是相互呼应地共同反映了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不断扩大规模的大众高等教育为广大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机会,而大众教育与社会各行各业密切联系的职业化发展方向则可保证广大青年学以致用,从而发挥高等教育推动社会改革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可维护大众化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赖以存在的合法地位。反言之,若现代高等教育仍囿于那以文科教育为主,以培养学者、神学人员和官吏为己任的中世纪大学的办学方向,那它必然不为社会广大民众所认可而继续处于社会边缘,也就不可能跨入大众教育阶段。因此可以说,职业性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它必然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共始终。

二、多样性: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制度保障

由于现代高等教育规模的空前扩张,受教育对象日趋广泛,培养目标不断丰富,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朝着多样性的“全民终身学习”制度发展。具体说:第一,在培养对象上,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教育民主化”和“终身教育”的思潮,高等教育的对象日趋社会化。具体表现为学生构成的多样性。例如,成人大学生、女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在逐年上升。据统计,美国25岁以上的成人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从1970年的28%上升至1995年的43%;女大学生的比例,从1950年的32%上升至1995年的56%;黑人、西班牙裔和印地安人等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从1982年的16.6%上升至1991年的20.6%。^[9]迈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一些其他发达国家的成人大学生也占相当比重。

例如,1982年奥地利25岁以上的成人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重为26.0%,芬兰为49.5%,法国为32.5%,德国为40.2%,瑞典为61.8%,英国为19.6%,澳大利亚为41.7%,加拿大为41.7%。^[7]第二,在层次结构上,从传统的单一本科教育层次扩展为具有“中等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即短期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纵向结构,这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纵断面日趋细化。例如,在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化的过程中,美国在加强研究生层次教育、培养科研人员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以培养行业技术人员。日本则分别于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先后发展了面向妇女的短期大学,面向第二产业的高专和面向第三产业的专修学校。英国在50年代创办了可授予毕业生以技术文凭(Diploma of Technology)的高级技术学院(Colle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为生产行业输送技术人员。第三,在办学形式结构方面,除了传统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外,许多国家都开办了部分时间制的开放大学、电视大学、夜大学、业余大学、函授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多种多样的继续教育或远程教育机构。如,英国在1969年创办了面向成人的远程教育机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泰国于1971年创办了兰甘亨开放大学,1978年创办了素可泰·塔玛提勒(Sukhothai Thammathirat)开放大学。韩国于1982年创办了韩国国立开放大学(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印度于1985年创立了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Indira Gandhi Open University),等等。^[8]又如,中国自1979年设立广播电视大学,1981年开办自学考试以来,成人高等教育得以迅猛发展。至1999年底,普通高校学生为436万人,成人高校学生为306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籍考生约为600万人。三者已成鼎立之势,共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现代高等教育体系。^[9]从国际来看,通过这些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日益增多。伴随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许多国家的远程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1)。^[10]总之,迈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的国家基本上都在二战之后建成了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办学格局,使大批适应社会需求的不同规格

的人才中脱颖而出。

表1 远程教育的大学生数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

国别	年份	大学生总数(1)	远程高等教育的学生数(2)	(2)/(1) %
泰国	1995	1 220 481	481 936	39.5
中国	1996	5 826 636	1 422 900	24.4
韩国	1996	2 541 659	327 185	12.9
印度	1990	4 950 974	525 727	10.6
墨西哥	1995	1 532 846	103 913	6.8
英国	1994	1 813 280	110 477	6.1

上述的多样性高等教育体制的特点:第一,成本较低。例如,英国开放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的费用仅为普通大学同类学生的1/3,研究生的费用不足普通大学研究生费用的一半。^[11]中国自学考试的费用不足普通大学学生费用的1/10。第二,地方化。许多成人高校、业余大学和夜大学是设在社区里,方便了当地在职人员的学习。第三,信息化。广播电视、电脑终端和互联网等通讯技术日益为发达国家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所利用。据统计,英国开放大学师生在1994年每天通过E-mail进行教学交流8000次,1996年上升为2.5万次。^[12]

综上所述,多样性的**大众高等教育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为社会下层广大民众提供了低成本的高等教育,扩大了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升迁的渠道,缓解了社会的阶层矛盾。二是扩大了成人、妇女、少数民族和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缓解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性别矛盾和种族矛盾等。三是提高了大众的学历,促进了就业,缓和了失业矛盾。国内外有关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调查统计与研究均表明,学历与失业成反比关系。因此,从这些高等教育的社会调控功能来说,多样性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促进大众化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近中心的保障。反言之,若高等教育仍承袭昂贵的、全日制的、单一本科层次的传统精英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迄今仍将自囚于封闭的“象牙塔”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无从谈起。对此,美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20%或30%的适龄人口提供教育机会的高等教育系统的

成本若要与为5%的人口提供精英机会的精英高等教育相同,那么一个社会不管多么富裕也无法负担这样一个高等教育系统。”^[13]由此可见,多样性的**高等教育制度**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有力保障,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三、民营性: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

二战后,许多国家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始终是走以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为主的道路。具体说,具有“学在官府”传统的韩国政府,在战后因经济局限,将有限的经费投入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则是采取让民间“自由发展”私立高等院校的“无为”政策。其结果却极大地刺激了民间办学的热情,使民办高等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占高校学生总数的比重,由1955年的55.2%上升至1998年的71.4%。^[14]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西、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向大众高等教育迈进的过程中,也在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另外,战后的日本在占领军最高司令部要求彻底清除旧的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情况下,其私立高等教育成了“民主主义”教育体制的组成部分而得以迅猛发展(见表2)。^[15]

表2 私立高等院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重的变化(%)

国别	年份	比例	年份	比例	增长 (百分位点)
韩国	1955	55.2	1998	71.4	+16.2
日本	1955	59.7	1994	76	+16.3
马来西亚	1961	0	1996	24	+24
泰国	1967	1.9	1995	45.85	+43.95
菲律宾	1965	88.8	1994	76.5	-12.3
印度尼西亚	1955	5	1994	63	+58
巴西	1960	44.3	1980	53	+8.7
哥伦比亚	1953	33.6	1983	60.4	+26.8

到了八九十年代,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于70年代中后期陷入经济危机,复苏迟缓,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在下降。如,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经费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从70年代到80年代下降了30%,同期日本政府对高等

教育的投入占高校总经费的比例也下降了14%。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走势使学生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就是再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难以再包揽高等教育的一切费用。就六七十年代政府力量大举介入高等教育的美国而言,伴随其高等教育规模在八九十年代的继续扩大,美国政府也难以维系六七十年代出台的高等教育拨款和资助政策。美国政府自80年代以来多次压缩教育预算,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对高等院校的拨款和资助占高校经费来源的比例从1980年的12.8%、45.6%、3.8%分别下降至1992年的10.8%、36.8%、3.7%。同期高校学费收入、销售与服务的收入分别从12.9%、19.0%上升至18.0%、23.4%。^[16]此外,人力资本理论也失宠了,认为高等教育最大的受益者是受教育者的理论开始风行了。这些因素使高等教育民营化运动得以蓬勃发展。其主要表现有:(1)大幅度增加学费。如,1975~1985年间,美国公立院校学费增长了140%,私立院校学费增长152%。日本公、私立高校来自民间的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从1970年的44.6%上升至1990年的58.9%,并于1984年首次超过政府对高校的拨款和资助。^[17]中国在80年代后期也改变了由国家包揽高等教育经费的做法,并开始招收“自费生”。1994年国家教委实行统招生与自费生并轨收费政策,1997年全面铺开,收费标准为培养成本费的12~20%。(2)减少助学金,增加贷学金。如,1983年至1992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助学金占联邦助学金和贷学金总额的比例从82%下降至74%,而贷学金总额的比例则增长了170%。英国政府于1988年通过新的教育改革法,改变了原来由政府包干学生的学费及生活费的奖学金制度,引进贷学金制度。(3)扩大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如表2所示,八九十年代,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西、哥伦比亚等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所占比重增大。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至1997年达1095所,学生119万,约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6.8%。^[18]伴随80年代

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这些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如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四国的私立高等院校的学生数从1990年的1.2万上升至1997年的32万。^[19]观之,80年代以来,走高等教育民营化的发展道路成了国际性的潮流。

那么,走民营化发展道路的世界潮流是否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从高等教育办学力量的历史演变这一层面来看,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处于培养少数人的精英教育阶段时,往往社会某个单一的力量就可举办。例如,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初是由学者团体组织举办的,带有行会性质,相对独立于教会或封建政权。美国殖民时期的高等教育则主要是由教会力量举办的。日本古代大学和明治维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均由政府操办。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从精英迈入大众和普及教育阶段,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宗教界或某单个行业都难以单独承担该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任,都逐步从依靠某一或某些力量办学转向依靠整个社会各种力量共同办学。而在整个社会力量构成中,非政府的社会民间各种财力的总和则远远超过政府的财力。由此而观,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民营化潮流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办学力量的演变的必然反映。所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民营性必将成为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伴随的一大特征。

四、关于我国发展大众高等教育的若干思考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向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迈进,笔者试图联系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就如何把握职业性的办学方向,完善多样性的高教体制和充分发掘社会办学力量,略陈管见,以供讨论。

(一)加强高校与社会行业的多层面合作

前面已述,大众化高等教育要以职业性为发展方向,面向社会经济主战场。我国目前有高职、高专和成人高等学校1345所,在校生398万,^[20]规模不小。但是,近年却出现“高职受冷落”的征

兆。一是部分高职社会科学的毕业生出现就业难的问题;二是高职入学新生的报到率偏低。其直接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高职教育仍然未适应我国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深层次的原因是,高职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不明确,未办出特色。如多数高职的课程设置系本科的“压缩饼干”,缺乏特色,收费又高于本科生2~3倍,故门庭冷落。高职收费高,又促使一些本科大学,甚至研究型的国家重点大学为了增加学费收入,也越俎代庖,办起职业教育班或职业教育学院。

如何解决“冷落”问题,关键在于正确树立高等教育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的正确思想,完善机制。这方面可借鉴美、英、日等国产学合作的成功经验。首先,办学思想要改变大学“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树立以社会为中心的“他方中心论”的新观念。将高校置身于社会活动之中,与所在地政府、企业、各种协会等组织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使大学和这些组织构成一个整体,以发挥整体作用。其次,可采用与地方政府、企业共建和联合办学,以及聘请校外人员参与校务活动组织等形式来建立相互作用的组织关系。再次,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研究型大学可以建立科学园为纽带,将高科技企业吸引到学校周围。如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武汉东湖的“硅谷园”,以及我国京、津、冀联手在京津塘高速公路两侧建设的“东方高科技走廊”。当然,要防止一哄而上。美国高校于1975~1985年间建立的科学园,有一半不能吸引任何高科技企业进园设点。^[2]以本科为主的地方性大学则可与地方行业建立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合作活动。高职高专可与企业结成伙伴,为企业培养预定规格的人才,充分发挥其职业教育职能。

(二)加强各类型高等教育的沟通与衔接

目前,我国多样性的高等教育系统已初步形成,既有部属、省属、地方大学和民办高校,又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多种办学模式。但它们之间尚缺良好的沟通与衔

接。具体说,目前高职高专与本科院校之间缺乏衔接关系,其毕业生则很难转入高一级的学习阶段。另外,专科层次的成人高校、电大、自学考试几类教育之间也缺乏有机的联系。这种相互封闭的体制,使大批高中毕业生冷眼看待高职高专,并仍然涌向本科大学。其结果,一是成人高校、广播电视大学和民办高校缓解社会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冲击的作用被削弱了。二是研究型大学被迫接纳过多的青年学生,也必然影响其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功能的发挥。除此之外,这种相互封闭的体制,还会强化上文所提到的“错位”行为——一方面,许多低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与院校拼命要求升格为本科,办研究生教育,以提高声誉,扩大生源;另一方面,本科大学,甚至研究型大学却在利用其名牌效应,举办高职高专层次的教育,抢夺高职生源,增收学费。这种“错位”不仅破坏了高等教育职能系统,而且还会使我国的大众高等教育陷入“扩张传统精英大学”的发展模式,进而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强专科层次的各类高等教育与本科三、四年级之间的衔接,为那些愿意继续深造的高职高专的优秀毕业生提供机会。增加高职高专的转学职能,反过来又可扩大其生源,促进其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职能的发挥。其次是加强各类高等教育的横向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立交桥”。

(三)鼓励社会力量办高等教育

鉴于“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以及我国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的现实情况,要迈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必须走依靠社会力量办学的民营化发展道路。具体做法:其一,扶植条件基本成熟的团体或个人创立和经营民办高校。社会团体与个人在初创高校时,往往难以面面俱到,完全符合标准要求。但只要其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政府应给予热情支持和扶植。如80年代福建华南女子学院校友会在复办私立华南女子学院初期,虽有校舍和师资,但资金短缺。幸有福州市政府给予多次资助,使该院得以顺利发展。迄今,该校已为福建省培养了2000名毕业生,受

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对此,有关部门应适时制定政策和规章,使之制度化。其二,在公立大学中设立“附属型民办学院”,实行“一校两制”。所谓“附属型民办学院”,是指隶属于公立大学,由作为其“母大学”(Parent University)的高校对其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指导和控制,并向其合格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的民办高等教育学院。设立这种民办学院的准则是:(1)完全的民间性质,其日常行政、教学管理及经费筹措均由学院自行负责。(2)学院教师主要由高校退休教师担任。(3)学院的招生在全国统一考试招生的前提下实行“宽进”,毕业实行与母大学统一标准的“严出”制度。(4)母大学只是通过它所组织的严格考试,来保证其附属型民办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学历标准,学院则要向母大学交纳一定的考试费和附属费。^[22]目前,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已分别设立了十几所此类学院。其三,试行教育股份制,设立高校产业化管理试点。股份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试行教育股份制,把民办高校作为产业来经营,可筹集到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保证办学资金的稳定性,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知识投入可以入股,也有利于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广东省私立华联大学1995年试行股份制经营管理,已初见成效,不仅解决了经费不足的困难,而且股东也获得了当年银行利率150%的股息,^[23]使该校步入了不断扩大的滚动发展轨道。1998年,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允许以股份制形式筹措办学资金”的鼓励政策,^[24]激发了该省社会办学的热潮。这些经验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 [1] [10]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3, pp. 210-223.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8 pp. 2-11, 2-25-26, 3-229-261.
-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
- [3] 教育部.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N]. 光明日报, 1999-02-25.
- [4] [6] [16] Thomas D. Snyder,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7,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pp. 36, 180, 182, 184. The Almanac of Higher Education 199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4 pp. 24-25. Thomas D. Snyder, 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tatistical Portrait,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3, pp. 76-77.
- [5] 冯增俊, 卢晓忠. 战后东盟教育研究[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7] J. R. Gass, Adults in Higher Education, OECD, 1987, p. 31.
- [8] [11] [12] John S. Daniel, Mega-Universities and Knowledge Media Great Britain, Biddles Ltd., 1997, pp. 30, 62, 111.
- [9] 我国教育事业获得较大发展[N]. 中国教育报, 2000-02-29日; 高校“扩招”未影响自考[N]. 中国教育报 2000-04-29.
- [13] Martin Trow,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on Future Structur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aris 26th-29th June 1973, p. 86.
- [14] 周鹤鸣. 香港台湾地区和南朝鲜新加坡高等教育研究[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1989. [韩] 韩国教育年鉴[Z]. 1999
- [15] Zaghoul Morsy & Philip G. Altbach, Higher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ritical Issue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p. 80-89. The World Bank, Higher Education: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Washington, D. C., 1994, p. 35.
- [17] [日] 广岛大学教育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统计数据[C]. 1995
- [18] 未然. 社会力量办学: 明天会更好[N]. 中国教育报, 2000-03-06.
- [19] 韩骅. 东欧四国私立高教异军突起[N]. 中国教育报, 2000-05-01.
- [20] 高职高专最新统计数字[N]. 中国教育报, 2000-03-13
- [21] David R. Powers, etc. Higher Education in Partnership with Industry,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8 pp. 83-86.
- [22] 赵中建. 创办附属型民办学院[A]. 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 [23] 曾秋苇. 私立华联大学对教育股份制的探索. 1999年3月“全国民办大学校长研讨会”论文.
- [24] 朱振国. 建设名副其实的强省——浙江省加快发展教育见闻[N]. 光明日报, 1999-06-13.